

党史人物故事(之四)

地下工作英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故事（之四）

地下工作英杰



洪泽 吴唯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成都

(川)新登字001

责任编辑：马 骏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李郁生

中共党史人物故事（之四）

地下工作英杰

洪 泽 吴 唯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双流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4.375 字数95千字

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220—02320—0/D·456

印数：1—2000册 定价：3.50元

《中共党史人物故事》编委会

编 委：王 淇 杨先材 聂运华
 朱伯颖 汪 新 温乐群

主 编：王 淇 杨先材

执行编委：朱伯颖 温乐群

《中共党史人物故事》

编写说明

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有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是他们，追求真理，上下求索，寻觅到救国救民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百折不挠，矢志奋斗，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以血汗和生命，换来人民共和国的新天地；是他们，奋发图强，不懈探索，总结经验教训，铺垫出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阶石梯……。他们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演出过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史剧。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共和国的历史，经过他们的主观创造，方显得那样波澜壮阔，那样瑰丽无比。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彪炳史册的革命先烈和前辈们，为了缅怀他们的丰功伟业，为了学习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情操，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精

神力量，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书。

在这套书组织进行过程中，我们力求使它体现以下特色：一、取材广泛。选取中国共产党成立70多年和新中国40多年来各领域各方面有代表性、传奇性的人物，其中既有革命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普通的党员和革命志士；二、内容丰富翔实。在全面占有和深入挖掘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这些人物的革命业绩和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个性世界和感情生活。并且将人物的主要特征、革命活动和贡献，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活动相结合，通过人物的活动深入生动地反映历史事件。三、可读性强。在编写中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极富感染力的动人故事，以记实和故事相结合的文体，力求做到生动活泼，雅俗共赏。既具有一定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适合于各类读者的需要。

我们首批推出：《毛泽东一家》、《播火者》、《革命浪漫曲》、《地下工作英杰》4本。

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党史人物故事》

编委会 199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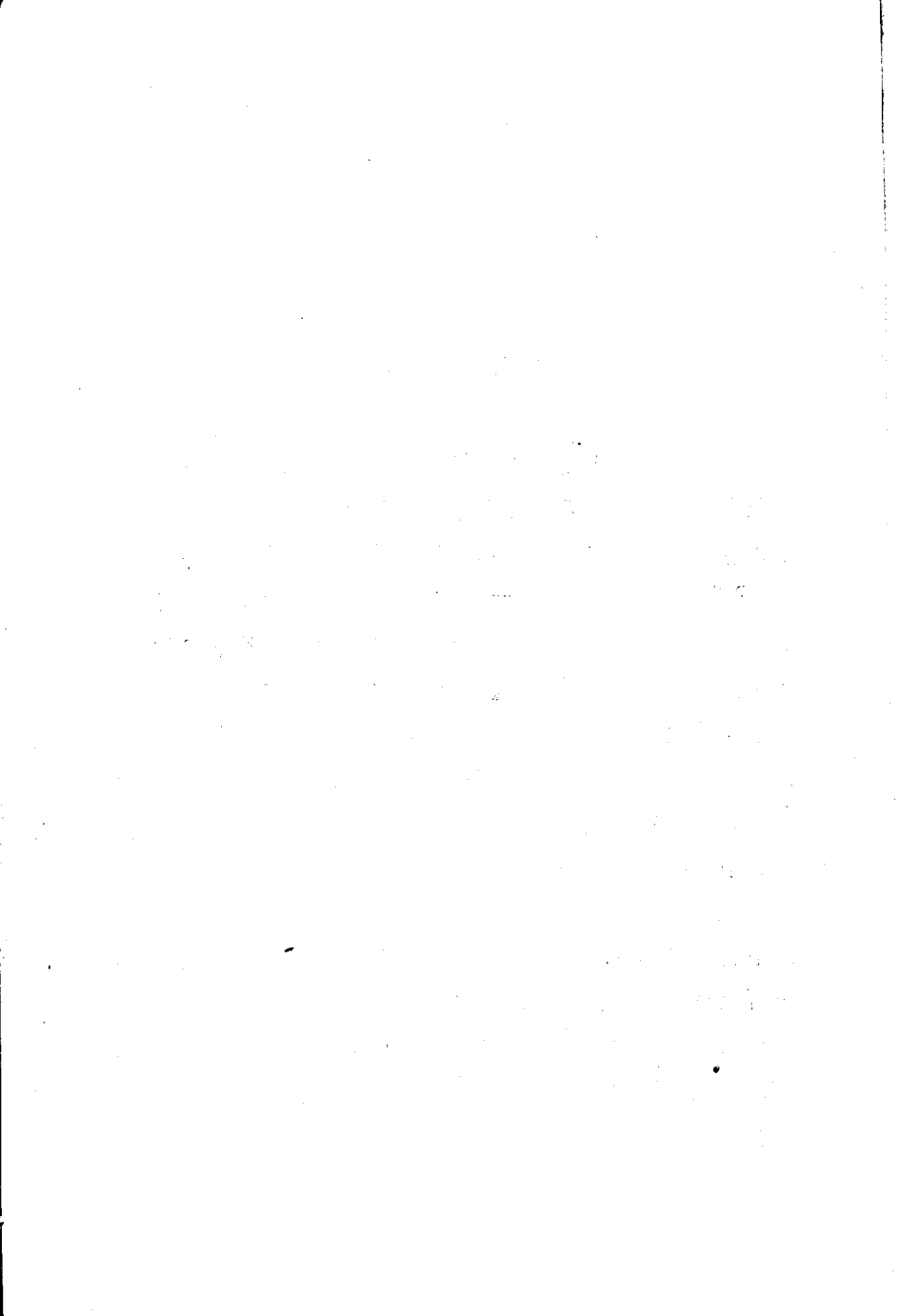
目 录

卷首语	(1)
一、周恩来主持建立中央特科	(3)
二、陈赓受命负责特科情报工作	(7)
三、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了第一个 反间谍关系	(30)
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中统核心	(42)
五、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53)
1. 处决叛徒何家兴	(53)
2. 镇压内奸戴冰石、陈慰年	(56)
3. 智救任弼时、陈琼英	(58)
4. 营救彭湃，严惩叛徒白鑫	(62)
六、粉碎顾顺章的阴谋破坏， “前三杰”完成使命归队	(74)
七、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取信胡宗南	(87)
八、通消息，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103)
九、送情报，保卫延安建奇功	(116)
十、英杰们的后来与叛徒的下场	(125)

卷 首 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上，党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始终坚持并逐步发展着一条秘密的地下工作战线，它与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的武装斗争相配合，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期的秘密地下工作中，曾涌现出一大批智勇双全、胆识过人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中，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奉献，艰苦地工作，用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演出了一幕幕险象环生、波澜壮阔的对敌斗争故事，为党的事业、为革命的胜利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长期领导党的白区斗争的周恩来曾说过：在我们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中，有着“前后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陈忠经、申健、熊向晖可以说是“后三杰”。他们都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贡献。本书所介绍的，就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地下工作的英豪们对敌斗争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周恩来主持建立中央特科

1927年的夏季是一个黑暗的充满血腥的季节，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昔日的同盟者举起屠刀，开始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肖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夏明翰、郭亮、向警予、张太雷等一批批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先后惨遭杀害，中共的省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工会、农会等进步群众团体被解散或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7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这次会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由大革命时期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的开始。会议根据白色恐怖的形势，确立了在白区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现时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就是自上到下一切党部都应“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规定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进行改造，健全组织，并严格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联系。会议特别强调，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是秘密党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与进行工作的基本条件。要求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当绝对服从党部机关的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一切支部都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进行秘密状态下的白区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和恢复工作，领导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城市，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中国的大本营，是著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工商业发达，工人阶级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上海租界区面积较大，华洋杂处，政出多门且不乏空隙，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这些都可加以利用；再加上全市人口复杂，住房易找，建立秘密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比较方便，也易于掩护。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法租界内，并陆续建立健全了一

些秘密的办事机构。

就在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不久，1927年11月初，周恩来从香港来到上海。周恩来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因患恶性疟疾高烧昏迷，同叶挺、聂荣臻乘一叶扁舟，从海上到达香港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在身体健康状况初步好转后，赶回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就任改组后的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以后任主任，从而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周恩来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主要对象之一。他认识的人多，特别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国民党上层的很多人都认识他，这无疑增加了他从事秘密工作的困难。因此，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处。并留起了胡子，化装成商人。他还把外出的时间定在早晨五、六点钟或晚上十点以后，甚至半夜一两点钟到外面活动。其他时间主要是约同志谈话，参加重要会议，处理有关文件等，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积极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的有关决议，领导着处于国民党地区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以及交通、情报等各种秘密工作的开展，为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新的形势下，党的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段时间，周恩来还直接领导建立了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中央特科。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虽然设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特务

警探，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到处寻找缉捕党的负责同志和党团员、工人领袖。特别是一些变节投敌的叛徒，投效国民党反动派，有的出卖革命者和党的机密，有的经常在马路上摇来摆去，到处寻找和协助追捕共产党人，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对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陈延年、赵世炎等人就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和被害的。为了保卫党中央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直接领导建立和健全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既是党中央侦察敌情的耳目，又是一支保卫领导机关安全，与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突击队。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在武汉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周恩来和许多同志总结了“四·一二”事变的经验教训，认为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打击敌人。因此，中共“五大”后，在中央军委下面，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特务工作处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在大革命进入最后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6月10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进行秘密会议；6月20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秘密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会议，以及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的秘密分共会议等，我们都及时地获得情报。只是，由于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虽然党及时掌握了敌人的

情况，却没有能够根据敌我斗争形势及时有效地作出应有对策，终于无法避免国民革命失败的命运。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为适应和保障白色恐怖中秘密工作的需要，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周恩来主持工作。在特委下设中央特科，作为执行具体任务的机构，也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成立时设有两科一队一电台，两科即总务科和情报科，一队是顾顺章带领的行动队（又名“红队”），一台就是李强负责的无线电台。以后随着工作的需要，特科的组织机构也日臻健全，逐渐发展成为4个科：第一科（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情报科）专做情报工作，第三科（行动科）专门负责保卫和锄奸工作，第四科（交通科）负责秘密交通联系工作。这4个科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互相配合，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一科建立最早。1927年8月以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至上海，为了建立各种领导机构，需要采购物资设备和布置机关，租赁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所需的房屋，为此就成立了专门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特科正式建立后，这个“总部”就改为一科。

一科的工作与党中央的关系最为密切，事情既多又杂。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对牺牲的同志负责收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这些事情十分琐碎，又必须做得非常机密、稳妥，稍有粗心大意，就会直接影响党中央的安

全，因而它的工作和特科其他工作一样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即以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为例，就使一科和红队的同志耗费过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每逢中央召开重要的会议，先由一科从安全着眼确定地点，然后租赁房子、布置会场、备办庶务。会议召开时，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护卫，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房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情况，外围人员即发出报警的信号，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份抵御敌人，一部份保护负责同志转移。

1930年9月，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一所洋房内。会议开了三天，与会者数十人。开会期间，“红队”全体出动做保卫工作，特一科派人在会场照料。会议中有的同志发言时情绪激昂，声扬屋外。周恩来立即提醒大家，在秘密工作环境中要注意安全。并吩咐一科的人员维持秩序，发言声音过高，应予以制止。由于布置周密，会议得以安全结束。

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会场，布置在法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一幢公馆里。楼上开会，楼下由一科的女同志打牌，开着留声机掩护。“红队”队员穿上厨师的衣服负责保卫会场安全，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这次会议参加人数多，工作量较大，为了保障会场的安全，一科和三科互相配合，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们

在英租界赫德路租下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家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举行大会的会议厅。一科同志在一楼充任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临时偶然闯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费等琐事，防止外人进入。同时，由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幢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紧急情况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的房顶，再经他的住房走出大门转移。为了确保安全，“红队”队员在这座楼房的周围布置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时，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房转移出去，为了确保与会同志的安全，一科还专门另租了一些旅馆，并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各式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后，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通过，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们进入“医院”，住到“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许外出。开会以前，完全按照普通医院的安排进行，每天有医生、护士前来查房，有服务人员安排饮食。到开会之日，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后，一科同志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象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一科的工作，还有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

等等。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一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曾经动员很大力量和各种社会关系，不惜巨款，不顾危险，积极进行营救。为购置必要的武器，一科通过关系，和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1930年特科通过中央军委，曾在上海一家外国洋行里买过许多枪支。并在当时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西北角转角处设立“三民照相馆”作为储存武器的地点之一。为使武器安全运送，一科常派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样，坐着流线型的卧车运送。此外，一科还以开店铺做生意的形式，建立了一些掩护秘密工作的各种机构，如水电行、木器店，甚至还在北京路开设了一个代办婚丧喜庆礼物的“信谊代办所”，作为秘密接头和传递文件的机构。

三科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红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会同一科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各种会议的安全。

中央迁到上海以后，为了打击叛徒特务的猖狂气焰，将曾在军委特务处工作过的一些同志集中起来，又从原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选拔了一些优秀分子，在中央特科设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亦称“打狗队”，由三科直接领导。“红队”的同志都是曾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们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打击特务，对于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时间威名声震上海滩。开始，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知道共产党有4条枪，但是这4条枪可以横冲直闯，在上海